

第二十四章

古都惊梦（华北行之三）

四周静悄悄的。屋角只有一盏不太亮的台灯，像一只忧郁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发现自己躺在日式榻榻密上，身边跪坐着一个披着头发的女人……哦，是霍大姐。想不到我已被剥得精光，只穿了一条裤衩，头上有一条湿淋淋的毛巾。霍大姐脸上一副哭笑不得，又心疼又愠怒的表情，举举手手中的折扇似要拷打我。恢复了神志以后的尴尬、难堪使我无地自容，想翻身坐起来，又被她用双手摁倒在凉席上。霍大姐点着一支烟吸了两口塞到我的嘴里，一言不发。

抽着香烟，我慢慢坐了起来，她将一件日本式睡袍披在我身上。于是，我只好腼腆地吞吞吐吐将与白处长的会见经过告诉了她。她静静地听着，没什么表情，只是温柔地安慰我：“别急，要有耐心……”

时针已指向凌晨一点，霍大姐示意我躺下，起身关闭了台灯。

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七点半钟。枕边放着熨烫平整的西服、领带、衬衫等衣物。霍大姐坐在我身边，像大姐姐对弟弟一样关切地问我：“今后如何打算……是马上回东北，还是在这里等待？”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逼视着我，使我不敢正视她，委屈和绝望一时涌上心头，不由得一头扑进她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她一边抚摸着我的后背，一边半责备半安慰地喃喃着：“要像个男子汉的样子。眼泪帮不了你啊……”长时间的拥抱和抚慰让我慢慢地平静了下来，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是我，亚男，崔大姐，你怎么来了！好极了，太好啦！马上来吧，我等你！”她放下电话精神一振，像换了个人一样。我知道有女客要来，站起身穿好衣服，打算告辞。一夜未归，栾兄会为我担心的。霍大姐却拦住我，说：“一会儿来的这个女人是咱们东北老乡，你可以和她好好谈谈，跟你很有关系……她叫崔婕。”

哦，是她。我想起来了。她是我们江上军军需处准尉王人楷的老婆，系杭州市日本特务机关的女特务！两年前，她回哈尔滨探家，内田顾问还接见过她。

此人四十多岁，瘦小枯干，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其貌不扬。混在人堆里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或者是个喝粉笔灰的教书匠，谁也想不到这是个侵华日军的鹰犬！

我反正无事可干，也就留下来一起等这个人。

楼下的日本小姑娘送上来早点 and 牛奶，我匆匆吃了几口就跑到楼下去给凤鸣园挂电话，告诉栾兄我昨夜在朋友家住宿，平安无事，下午回饭庄去。

我正在屋里对着镜子系领带，霍大姐在楼下忙了一圈儿又回到了楼上。她跪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像个地地道道的

日本女人。忽然，她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一下子塞进了我的西服上衣兜里，并摀住我的手，不许我掏出来也不许我点数。她抓住我的领带一边扶正一边说：“这是零用钱，花光了再拿……”

我窘得满脸通红，霍大姐也把我当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了！其实在我住处的小皮箱里的钱还足够花。但她不容我分辩、推辞，我也只好罢了。

九点钟左右，楼下的日本小姑娘上来报告：“太太，有客人来了。”霍姐立刻迎了出去。

果然，进来了一个穿着朴素，鬓发霜白的老太婆，正是我曾见过的崔婕。她的打扮、形象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不知是否有意这样装扮，我不便多问。在霍姐介绍之后，顺便提起与她丈夫王人楷是同事，她不免又客套了一番。谈话中，霍大姐爽直地把我来北平的目的告诉了她。想不到她一听，竟然高兴得要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跟我走，到南京去！我保你飞黄腾达，一定……”

我记得她在杭州工作，怎么又要去南京呢？这老太婆从手提包中拿出两张名片给我和霍大姐一人一张。只见上面用大字印着：大日本帝国支那派遣军、南京特务机关；崔婕。

霍大姐的眼睛瞪人了一圈。

崔婕向我打听了一下哈尔滨的情况和家里的事，但对自己来北平的日的一字没提。时近中午，我一定要告别时，她郑重叮嘱我一定要考虑一下跟她去南京的事。霍大姐送我下楼，让我晚上与她用电话联系一下。

穿过餐馆前厅，身后似乎有一双怨毒的日光直刺我的后背。谁？眼中余光扫过，原来是第一次到这里时接待我的宫先生。那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仇恨，令人费解……

天气阴霾，轻风拂面，我漫步走回了凤鸣园饭庄。

在大堂里见到栾、聂两位老兄，只好对他们扯谎说昨夜在朋友家打牌、喝酒闹了个通宵，并打了个哈欠。栾兄便赶我回去睡觉。他陪我走出街口，对我说：“树榆这小子言行不检点，是在洋行里混事惯坏了。你初来乍到，又年轻，嘴要紧点啊……回去睡一觉吧。”

我确实需要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下了。假期将尽，又进退维谷。现在必须做出决断了。

打开小院门，屋子里闷乎乎的。顺手推开纸裱的窗户，看到床上有栾嫂为我铺好的凉席和毛巾被，心中涌过一股暖流。这栾氏兄嫂对我的一片深情厚谊让我如何报答呢，眼眶不由得一阵发潮。

脱掉上衣，忽然想起霍姐塞给我的钱，掏出来一数，共十一张。又是个不吉利的单数！躺在凉席上，我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带花纹的天棚纸，眼前浮现了衰老的爹娘和妻子的泪眼，孩子张开的小手……窗外轻风吹来，把床上的流通券吹落地上好几张。

回去吧，回东北。那里是我的家啊！军法处置，蹲大牢，枪毙，听天由命吧！

不知什么时候小宝印跑了进来，蹦蹦跳跳地将地上的钱一一拾起来交给我，大声喊叫：“爹说这两天就搬家……”我懒洋洋地站起来，把毛巾扔进门口的水盆里浸透再拧干，擦了把脸。小东西建议我下午和他一起去景山公园，他非要去亲眼看一看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不可。并说树下的

石头上还有皇帝留下的脚印呢。我把一张一万元的流通券送给他，让他买零食用，他大喊着不要，不要。这个小乖孩！于是我将从东北带来的日本樱牌钢笔赠给他作纪念。这下可把他乐坏了，在院子里像小马驹似的直蹦高。

中午，他强拉我回后胡同家里去吃饭，我实在懒得动弹，便带着他径直去景山了。路上每人吃了一碗北平的风味小吃“荞麦碗坨”，真是异乡风味的独特小吃。

景山公园是个颓废的皇家园林。山河破碎，这里岂能独免？攀折的树木，断墙残垣，碎琉璃瓦，满目凄凉。

小宝印找到了传说中崇祯上吊的歪脖树和踏脚石，但并没看到什么靴子印。小家伙非常失望，满怀疑问，怔怔地望着我，希望得到一个答复或者解释。可我并不比他更聪明，知道的也非常有限。皇帝的万乘之躯也不过百十来斤，石头又不是豆腐，怎么能踏出脚印来呢？一个民间传说而已。

历史就是这么回事，正史、野史、民间传说，是是非非很难弄清。人嘴两片皮。现在的汪精卫明明是汉奸，报纸上却吹捧他是中华精英；“反共、和平、建国”明明是卖国，人家却标榜这是“曲线救国”！与谁论理去？

下午四点多钟，我和小宝印才拖着疲倦的身子走进风鸣园。一入大厅就感觉气氛不对头，栾、聂两位掌柜的好像急红了眼，齐声大叫：“哎呀，你们可回来了！小兔崽子，你把左叔叔拐到哪儿去啦……真急死人啦！”

“中南海来了好几次电话找你呀！哎呀呀……”聂掌柜的一边拍大腿一边数叨，我弄不明白这中南海与我何干。

原来这中南海是华北临时政府所在地，也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办公处。这里是民国以来历届政府的办公地点。这种地

方打来电话，难怪老百姓要吃惊了。聂兄说打电话的人是女的，叫你一回来马上与前门的什么饭店联系。我弄明白了怎么回事，立刻给黑猫料理店挂了电话。霍大姐在电话里责备我乱跑失踪，让我立刻去见她，天上下刀子也得去！我立刻出门坐上了洋车。

霍大姐像老鹰抓兔子一样把我揪上了楼。

房中塌塌密上躺着一个瘦小的人影，像一小捆不足七十斤的干柴，这是崔婕正在假寐休息。知道我来了，她翻身坐起，一边找眼镜戴上，一边用日语说：“辛苦了。”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霍大姐殷勤地递给我一条湿毛巾擦脸。俩人一起问我是否考虑好了，何去何从？

这时，我再不能犹豫了，肯定地表明了回东北的决心。

她们默默听着，连连点头，对我的决定和理由表示谅解。但崔婕仍断然向我保证，如果我同意随她去南京工作，她立刻就能用电报或文件与江上军内田顾问联络，保证能得到谅解和同意，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但仍被我婉言谢绝了。崔婕点点头，喃喃地说：“既然如此，我当然不能勉强你。只是皇军圣战大业，正缺少像你这样的人才，真是太遗憾了……”她说的是纯正的日语，对皇军的忠诚溢于言表，使人怀疑她不是个中国人，而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血统的女人。

小楼上电扇嗡嗡响，凉风习习。室内足足沉寂了两三分钟，最后崔婕问我什么时候回东北，并许诺卧席车票和一路上的安全以及签证完全由她来安排。明天已是我假期的最后一天，即使现在上车，到哈尔滨也是超假了。当然是越早走越好。我说三天之内一定得走。

于是，崔婕一言为定：“我明天要回南京去，大后天一定有人来送车票。”嘱咐霍大姐只管接东西，不要多讲话，别管来的是男是女，是否中国人。她三言两语，举止从容。又转身对我说：“左君回哈尔滨，我有一件小事相托，相信你一定会办理妥当，我非常放心……”她缓缓地从小提包内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来，从中倒出一小堆黄澄澄的金元宝来。仔细一看，是十个小元宝，比蚕豆大一点儿，金光耀眼。捧在手上也只是一巴掌，不到十两重。

她托我把这十个元宝捎给丈夫王人楷。我答应下来，但对如何通过道道关卡保住这笔财产没一点把握。她十分清楚这一点。又取出一张名片来交给我，上面印的也是与她名片上相同的部门，中央大字印着：陆军大佐香月增荣。她告诉我，非到紧要关头不必露此名片，光她的名片就可以保证我畅通无阻了。

烈日西斜，灼人的阳光被前门箭楼遮去了大半。霍大姐叫上来那个日本小姑娘，让她把晚饭开到楼上来。

想不到在北平也能喝到真正的日本“札幌”啤酒。七八样小菜，中日合璧，十分精巧，尤其日本的那种“泽安”咸菜甜脆可口，非常好吃。于是，我便和她们对坐畅饮起来。

这崔婕几杯酒下肚，话渐渐多了起来，开始谈笑风生。我不时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年仅四十一岁的女人。这个年龄并不算老，但她却已是两鬓霜白，背部都有些佝偻了；皮肤白皙但眼角已有了鱼尾纹。可想而知，这个女人已将她的青春年华多半奉献给了大日本天皇，她如果死了，理应跻身于靖国神社的众牌位之中。可惜日本庙不收外国鬼，充其量她只能作庙外的游魂……

有前车之鉴，我十分谨慎，不敢多喝。两个女人却痛饮

不止。

楼下有摩托车停下的声音，下女来报：“太太，有一辆摩托车来接客人……”从窗口往下望去，果然停着一辆土黄色军用摩托车。姓宫的人正在和司机抽烟闲谈，我以此断定这宫某人一定是“宪补”一类人物无疑。崔婕动作敏捷，毫无醉意，匆匆收拾一下提包等物便与我握手告别：“恕我不能给你送行了……一切拜托，祝你一路平安。让他给我来信，多谢了，再见！”霍大姐陪她下楼而去。

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据说日本投降后，她被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枪决，她丈夫王人楷则说她病死狱中云云……

霍大姐回到楼上，将那个牛皮纸信封叠成条形，又用一块手帕包成一个小小的包裹，亲手塞进了我衣袋里。告诉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两天好好玩玩，可惜我不能陪你了。一定要坐洋车直接回住处。车票送来我立刻给你打电话……回去吧。”

坐在洋车上，晚风吹拂，我心里觉得一下子轻松多了。

进了小院，室内灯火通明。栾兄嫂、梁大哥和小宝印正在欢欢喜喜地吃搬家“燎锅底”的夜饭，酒菜丰盛。又是一番谦让。我坐下来，让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听我说，详细地向他们描绘了我在黑猫料理店中交谈办事的经过。

栾兄文化虽然不高，但人生阅历丰富。他的一言一行常常成为我生活的指南，所以我毫不隐瞒地把内心的一切想法全向他亮了出来。最后取出那十个金元宝给他看。

梁树榆看着这小堆黄金，若有所思。指出，这元宝说不定是南京大屠杀时，那个女特务从百姓、商人尸身上搜刮来

的呢。听得我手一哆嗦差点把金子扔在地上，灯光下，一个个黄澄澄的小元宝上似乎隐隐泛出了血红色！

“那不如干脆就给它没收……”我小声道。众人的眼光立刻都集中在我的脸上，许久没人说话。栾兄摇摇头，正色道：“使不得。古人云，不义之财不可取，取之必有祸。这点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与做人的道德、良心相比，一钱不值。世间权、势、财皆是命里有分，千万不可强求。是非祸福上天有眼，老弟决不能一时迷乱、冲动而让良心受磨难呵……”

梁兄对姐夫的意见深表赞同。我将牛皮纸信封交给栾嫂，她接过掂掂分量只是一笑，答应为我缝个布袋，绑在腰上好便于携带。

第二天，梁树榆特意请了假，陪我去游颐和园。在湖边的茶座中，他把洋行里英文报纸上登载的欧洲战场上的情况向我做了简单的介绍。

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初，美、英、苏三大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攻。1942年10月份，英国军队在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挥下，于北非的阿拉曼突破了德军防线，希特勒的爱将“沙漠之狐”隆美尔被打得抱头鼠窜，不顾希特勒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扔下意大利军队自己逃命，使意大利军队三万多人成了盟军的俘虏。那“沙漠之狐”尽管跑得快也已溃不成军，身边只剩下三十多辆坦克，总算没全军覆没。

就此，阿拉曼战役成为了二次大战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同时，大约是1942年11月份，逼近苏联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展开大反攻的苏联红军包围，打到1943年初，

被困的德军已被严寒、疾病和反击夺去了八万多人的生命。最后，德军终于支撑不住，保卢斯元帅挂出了白旗，率残部九万余人投降，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将军和两千多军官。为这次惨败，德国全国的教堂都敲响了丧钟……“轴心国”自己已经预感到灭亡之日临近了！

5月中旬，盟军在北非发动的突尼斯战役结束，德、意军队共二十五万人被俘虏。

紧接着6月初，也就是上个月，报上又刊出特大新闻：美日两国在太平洋的中途岛上展开大战，美军以少胜多，一举摧毁了日本海军的四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击落数百架飞机，歼敌两千多人。美军损失却很少，总算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日本海军从此将一蹶不振，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了。

这些消息，日本军事当局虽然严加封锁，但身在英国洋行工作的梁兄却通过看英文报纸而一览无余。

梁兄竟然毫不隐讳地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势必在两三年内结束，世界上将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我问他中国的前途如何，他说，日本战败后，中国国土的光复当然不成问题，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斗争决不会停止。逐鹿中原，谁胜谁负只有拭目以待了。

他对姐夫栾子玉的见识和为人十分敬佩，说：“左老弟，你如果真的抛下父母、妻儿随那个姓崔的女人去南京，充当日寇侵华的马前卒，我们这朋友就无法再交下去了。到那时，你势必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是身败名裂，了此一生。你这次来北平虽然一事无成，但这也是天意。眼下不必为回去的后果担忧，老弟聪明过人，到时如何见机行事想必不用愚兄身援手教……为了顾全今日，苟延残喘，在敌人屠

刀下跪地求饶，我以为是权宜之计，唬弄鬼子不算失节。没听过‘韩信曾受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食粪图存’的故事吗？来日方长，弟尚年轻。暂时回去委曲求全我看是最佳选择……”

夕阳西下，佛香阁流金溢彩，昆明湖金波荡漾，像亿万颗宝石、金豆在闪耀、滚动。水光山色格外迷人。听着梁兄滔滔不绝地宏论，看着如诗如画的风景，祖国大好河山如此壮丽，而我个人的一切却这样藐小、丑陋、可怜……心里一阵酸楚，不由得掉下泪来。

我和小宝印的床位被安排在新居的西屋。一大早，小家伙已抛开毛巾被不知去向了。

栾嫂操着唐山口音一边骂孩子顽皮、淘气，一边走进来为我们整理房间。她那双放了足脚走来走去忙个不停，善良的面庞，勤勉的身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一个壮汉担着木桶又来送水了。北平清凉的井水真比东北的汽水还好喝。送水的汉子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满怀戒意。看来，他已认出了我东北人的身份，我只好苦笑着走开了。

我到街口的一家粮油站给霍大姐挂了个电话，车票还没有送到，但她非要我去店里见她，小死鬼，八卡牙路地骂个不停。我说今天要去逛逛故宫，晚上能不能去还说不定，就放下了电话。

梁兄和我带着小宝印进了故宫，这里的宏伟建筑让我目瞪口呆，像刘老老进了大观园，两只眼睛不够用。心中不由感叹：怪不得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垂涎……如今山河破碎，百

姓罹难，这故宫里的珍宝恐怕已经被各路鬼子抢得精光了吧！……现在我已超假两天了，东北的家中说不定已是地覆天翻，警察、宪兵一定在到处搜捕我，而我却在这皇宫里游荡……真是人生如梦，不如就让我在这梦境中游荡、昏睡，别再醒来。

走得人困马乏才出来，坐上两辆三轮车直奔王府井。小宝印靠在我身边，一路上不停地吵嚷着这个好看那个新鲜，汗水在秃脑门上流淌，背中央吊着那枝樱牌钢笔。

凤鸣园里午饭口已过，晚饭时间还没到，但对我们三人随时可以开饭。小宝印在狼吞虎咽，吃得香甜有声。我和梁兄慢慢地啜饮“天坛”牌啤酒。这时，前边柜台上的栾兄大喊：“左兄弟，电话……”

一定是车票有了。我急步过去拿起了听筒，果然是霍大姐的声音：“左弟，快来，马上……”咔嚓一声就挂断了。

我坐上叮当车，直奔前门大街。

黑猫料理店生意十分红火。前厅里宫先生表情很不自然地告诉我，霍姐在楼上。

楼下人声喧哗，楼上却静悄悄的，似乎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沉寂。拉开纸隔扇门，霍姐正呆坐在屋角，一见我进来，立刻跳起来扑在我身上，抱着我汗淋淋的肩膀就哭了起来。断线般的泪珠立刻打湿了我的肩头和前胸。不知是东北老家有什么凶信还是崔婕女士刚刚遭到了锄奸团的暗杀？我慢慢推开她，轻声盘问。她一言未发，只是递给我两个信封，都是牛皮纸的军用品，我先打开那个启了封的，抽出一张薄纸，上面有铅印的公文字样和毛笔填写的内容：

“陆军中尉黑田龙二于×月×日光荣战死在支那山西省太行山上……”我一时呆傻如木偶，心绪万端却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霍大姐坐下来痛哭不已。

霍大姐起身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我接着打开了第二个信封，信皮上写着：“前门大街，黑猫料理店，左奇峰先生亲展。”里面是两张普通的厚纸印制的火车票。一张是车票，另一张是卧铺票。两张票背面都有“军用割引”方形的戳印。时间是明天下午七点十分，直达哈尔滨的。使我吃惊又感激的是信封里还有两张面值百元的满洲国通用的“老绵羊”钞票。附着的便条上有崔婕的亲笔字：“左君，我已返南京，今送去车票、卧铺票各一张请收下。外二百元纸币留着无用，请于路上零花吧。所托之事务请费心代劳，谨祝一路顺风，圣战完遂，崔婕。”

我按捺住兴奋的心情，表情严肃地把东西展示给霍大姐看。她只扫了一眼纸条上那女人娟秀的笔迹，点点头，似乎深有感慨。然后把一张四寸左右的照片递给我看，这就是她的亡夫黑田龙二。一个四十岁左右英俊的日本男子，身穿西服，腮下略有胡须暗影。霍大姐低声说：“这就是他，七年前我们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相识。当时他是特务机关的谍报员，公开身份是记者——战前他就是记者。毕业于日本国内庆应大学……”我只有默默点头，作以假惺惺的叹息。双手将照片举过头表示默哀，然后还给了她。把车票一类东西装入信封收好，我无言地坐下来。霍大姐理理鬓发下楼去了。我在想自己的心事。

霍大姐和一个姑娘端上来两大木盘食物、酒菜，看样子她要利用这最后相聚的一天与我一醉方休，借以浇愁。

她的酒量让我吃惊，四瓶“札幌”啤酒只剩了一瓶，另外还和我喝一壶正装的日本米酒“菊正宗”。那个小姑娘偷偷上楼来窥探了两三次，时时添酒加菜，还有些担心的神

态。

霍大姐边喝边说，告诉我，她与黑田曾在哈尔滨的马家沟共筑过温巢，两年前才因“皇军”的胜利而来到这华北的重镇北平。“黑田以记者的身份踏遍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如今血染太行山也是他必然的归宿！哈哈哈……”狂笑与梦呓混杂，啤酒和眼泪交流，她口齿已经不清，含混地说：“好兄弟，咱们都是东北人，都有思乡病，哈尔滨、松花江有我终生难忘的梦哟……回去给我寄一瓶松花江水来吧，那是养育了我的一方水土啊！原谅我明天不能去送你了，今晚就算大姐为你饯行……”猛地喝下一大杯酒，她一头扑向我的怀里，抱住我的脖子拼命亲咬我的面腮。眼泪、口水涂了我满脸满胸。我把她轻轻放倒在凉席上，她一只手长伸，一条腿弯曲着似乎醉死过去。

我俯身凝视着这个仍十分漂亮、健康的女人，为她感到深深的悲哀。她如此伤痛不仅仅是失去了丈夫，而是在为无望的生活在哭泣。一个女人，当她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个无法终生厮守的男人时，那么，她的痛苦就已经注定了……

我一个人伴灯独坐，顺手启开最后一瓶啤酒，注满了玻璃酒杯。楼下隐约传来悲凉的歌声：

“红烛将残，杯酒已干，

相对无言、无言。

浔阳酒醉不觉长夜何漫漫。

共君一夕话，明日各天涯，

纵然惜别终须别，谁知何日是见期……”

霍大姐翻了一个身，又昏睡过去。楼下的歌声渐大，好像一群男女的齐唱：

“桂花凋落了，来到这小小的园里。

苦的心，死的灵魂也有沉醉意。
谁的青春谁不怜惜，苦恼有谁替？
往日的欢乐，甜蜜的笑语，
永远没有归期……”

这是两首东北流亡学生常在校园中传唱的歌，悲凄、哀婉，一时传遍了沦陷的中国各地。但这个酒店是日本特务机关的联络点啊！谁这么大胆，竟敢在这种地方唱这种歌？

果然，楼下的歌声被斥责和驱赶声打断，乱成一片。我草草给霍大姐写个纸条：

“霍大姐，谢谢你对我的关怀和偏爱，明天不要来送我，一切珍重，后会有期。我永远忘不了你……”

我下楼把那个日本小姑娘叫上来收拾餐具，照顾霍大姐。顺手把电扇关了，霍大姐躺着，死了一样不省人事。我拿着装车票的信封悄悄下了楼。

在大厅的人群中穿过，看见宫先生和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推推搡搡，指手画脚地争辩着什么。

外面，满天星斗。

这是我在北平的最后一个夜晚，索性漫步走回去。回首看了一眼黑猫料理店，楼顶上那只用霓虹灯装饰的大黑猫正冲我瞪着眼睛……

栾嫂和宝印已经睡熟，栾兄在院里用冷水擦澡。他告诉我，为了在天桥一带“刮地皮”，今天绥靖军和当地的警察因为争夺地盘打了起来，开枪伤人，弄得满城风雨。总之，不管结果如何，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早晨，八点刚过，我就雇了一辆三轮车先把柳条箱送去火车站办托运。货运处仍有两个佩红袖章的“狗子”把门，

我向他们出示了有“军用割引”戳记的车票，他们立刻点头哈腰露出笑脸，跑上前竟帮车夫把行李抬进来过秤，开单子。临走我一个铜板也没赏他们，两个“狗子”还赔笑着连说：“您慢走……”他妈的，多么可恨又可怜的亡国奴相，与我何其相似乃尔！

今天，我想一个人去东安市场遛遛，栾兄再三关照我，一定要在三点以前回来，说要在饭店为我饯行。

逛累了，我就到一家叫“华清池”的澡堂里去泡着。耳边听着浴客们在议论昨天绥靖军与警察在天桥交火的事，心里不由得合计起回哈尔滨以后如何混过军法惩治这一关。

直到三点半钟我才回到了凤鸣园。不想梁兄大马横刀战胜了栾兄的盛情，将我和小宝印“绑架”去了“东来顺”。

小乖孩宝印好像不知道几个小时后我即将离去，或许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离别，只是胃口极好地闷头划拉桌上的菜。

梁兄话不多，似乎也很伤感。只是宽慰我，反复强调“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一切目的都是在这乱世保住性命，为了父母和妻儿，那些“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的豪言壮语都不适合我们目前的处境。

回到栾兄新居，已是五点多钟，归心似箭的我开始打点行装。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心情，也主张出门“宁早勿迟”的信条。栾嫂亲自把那裹着十个金元宝的小布袋仔细地缝在我裤腰内侧，又摸又拍打，像对待一个骨肉兄弟远行。千叮咛，万嘱咐，热切、温馨之情浓浓地浸透了我的心田，一时忍不住落下泪来，叫了声：“我的好嫂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梁兄和小宝印陪我去车站。回头远远望见小院门前站着眼含泪光的兄、嫂，摆摆手，心里道一声珍重，再也没有勇

气回望一眼，三轮车启动了。

车站附近气氛非比寻常，好像要护送什么大人物，马路两旁有站成仪仗队的绥靖军和黑衣警察。途经黑猫料理店，我想下车去向霍大姐告别，被梁兄坚决制止了。

车站大厅的时钟指针在六点三十分格上，列车已停在了月台旁。我的车票畅通无阻，梁兄、小宝印连月台票也无须买和我一起大摇大摆地上了车。这时普通旅客还没放进来，车上车下全是高官显贵和他们的娇娘美妾。带绿色袖章的列车员殷勤地将我领进软卧车厢。

还不到七点钟，站外高高的城墙阴影已将月台和列车遮得一片昏暗。这时进站口才开始检票，一时间嘈杂的人声和呵斥声又乱成一片。那些如狼似虎的警察搜掠旅客的财物行动又开始了。

离开车还剩十几分钟，我忽然把身上所有的华北流通券一股脑儿抓出来塞给了小宝印。小家伙竟抱着我放声大哭，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梁兄与我握手告别，小宝印却搂住我不撒手，弄得我一阵阵泪眼模糊。在拥挤的车门口，列车员强把我们分开，关上车门。我把手提箱扔在行李架上，吃力地提起半截车窗探出身去。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开动了，月台上梁兄举起文明棍向我致意，小宝印一手抹眼泪，一手频频向我挥动……列车缓缓而行，突然我发现在一个大柱子后边，有一个上穿白衫下着黑裙的女人正在向我呆望——啊，霍大姐，是她。她面无表情，呆呆地向我凝视着。我不由得心中一酸，带着哭声大喊：“霍大姐！——”她好像听见了，一只手举起来轻轻摇了摇，仍站着没动。列车渐渐加速，一股黑烟卷过，将月台上的一切都融入了昏暗之中……

夕阳残照里，占城北平的城垛和前门箭楼浓缩为一帧剪

影永存在我的记忆中，上面叠印着栾氏兄嫂、小宝印和梁兄等一副副可敬可爱的面容，还有霍大姐那双漆黑、忧伤的眼睛……

（1952年到1953年左右，我曾先后数次去上海、青岛等地公出办事，每次都特由天津转车去北京探访故人。但栾氏兄嫂、小宝印、梁兄和霍大姐皆无下落。交道口有枣树的小院里是陌生的面孔，一问三不知；“凤鸣园饭庄”已改成旅店，“黑猫料理店”变成了邮电局……沧海桑田如是，奈何?！）